

##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一个低速发展阶段；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为标志，反全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为此许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全球化。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事关世界经济的发展路径，进而也将直接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选择。

探讨经济全球化的走向首先要分析导致当今逆全球化浪潮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前者表现为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后者则表现为影响和制约这种跨国流动的规则和秩序。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力属性是由技术进步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所决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从低级到高级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关系属性是由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如果规则与秩序适应了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就会步入加快发展的繁荣期。反过来，如果国际经济规则无法适应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要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会放慢，甚至是停滞或倒退。

导致逆全球化浪潮的因素大致有三类：一是一国之内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在全球化的繁荣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上升，这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密切相关：和比较劣势产业的从业者相比，比较优势产业的从业者从全球化中的获益更大。以美国为例，全球化的获益者主要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技能就业群体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从业者；相比之下，以“铁锈地带”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工人则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当然，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很大程度上也和政府不作为密切相关。不久前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合组织国家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降低基尼系数的幅度平均为 37%，其中美国仅为 22%。二是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与一国之内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恶化不同，对国与国之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认知更多体现为各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升降。过去三十年间，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大幅上升，而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大幅下降。后者通常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经济全球化。三是国际经济规则无法适应跨国人口流动的要求。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中，最受人们诟病的当属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规则。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理论上劳动力应该和资本、技术一样实现跨国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这种流动从未真正实现过，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保证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的多边规则。以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例，尽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自然人流动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抵制，所涉及到的自然人只限于“服务提供者”，且相关规则不能与成员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业法规相冲突。即便如此，来自发达国家对移民的敌视正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在美国，特朗普执政后不仅颁布了限制外来移民的一系列法规，而且决定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筹划出台法规限制合法移民入籍和拿绿卡，预计将涉及到 2000 万人。在欧洲，长期以来对移民持宽容态度的欧盟也开始改变立场。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盟“不可承受之重”，不仅威胁到成员国的内政，而且威胁到了欧盟的统一立场。需要说明的是，导致逆全球化的这些因素既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也有其主观性的一面。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些因素并不被人们所关注，而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这些因素就会演变为反全球化的口实。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长达十年的低速增长客观上助长了逆全球化的兴起。

如果说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转折点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话，那么总体上我们目前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下行周期之中。换言之，逆全球化所引发的负面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针对未来 5-10 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

第一，鉴于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难以适应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要求，短期内经济全球化将出现停滞或局部倒退，但长期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一方面，以“买本国货、雇本国工人”、“制造业回流”为代表的保护主义有可能会损害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区块链、3D 打印、基因、大数据、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比如，区块链技术的进步不仅能解决互联网交易中“第三方平台”的信任难题，而且直接派生出了数字支付中的比特币。这将改变传统

意义上的国际间交易方式，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升级。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种意义上，保护主义不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永久性障碍。

第二，在多边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护主义势力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与体制持消极立场，从而对经济全球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经济全球化所依托的贸易、投资、金融规则和机制首先是多边层面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在多边层面制定规则，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经济全球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然而，近年来美国开始公然质疑多边规则和多边机制的合理性。比如，在《2018 年贸易政策议程和 2017 年关于贸易协定的美国总统年度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确指出，过去二十年间世界贸易组织的弊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弊端包括：滥用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谈判无法达成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规则；最不发达国家地位和权利界定混乱；少数大国违反多边贸易规则，等。为此，美国要求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全面改革。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与欧盟、日本一起倡导构建“零关税自贸区”，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另起炉灶。一旦成为现实，众多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二次入世”的挑战。很显然，这些破坏多边规则和机制的做法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未来多边层面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向何处去最终将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结果。

第三，在区域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应对来自保护主义的威胁，但开放的区域主义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是一对特殊的不确定关系：如果区域主义奉行封闭原则，它将会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原因是遍及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将成为封闭的贸易集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阶段，保护主义就曾经表现为大国主导的封闭贸易集团之间的恶性竞争。反过来，如果区域主义奉行开放原则，它就会演变为多边主义的“垫脚石”，因为任何类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自由化程度都高于世界贸易组织。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与开放性相结合就会产生“滚雪球效应”，最终把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推广到全世界。目前经济全球化处于下行周期，各国对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特朗普政府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体上持消极立场，因而自上台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随后对美国业已签署的自贸区协定展开重新谈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未来会完全排斥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要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是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对欧盟和日本来说，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固然有应对保护主义威胁的考量，但主流的理念是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最近，日本不仅成功引领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而且与欧盟签署了日欧自贸区协定。至于中小型经济体，他们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机更多地是要规避保护主义的威胁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由此可见，面对逆全球化的浪潮，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尽管不同国家的动机存在差异，但只要能够奉行开放性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会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

第四，在双边层面，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保护主义者试图把自由贸易理念转变为公平贸易理念，这是对经济全球化最直接的挑战。虽然公平贸易概念并非特朗普的首创，但他却是公平贸易政策的第一个实践者。所谓公平贸易，核心就是对等。这种对等不仅是市场开放度的对等，而且还是贸易收支的对等或平衡。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看，这种意义上的公平贸易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战后，美国的贸易收支大多数时间内呈现为逆差，但它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实现了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双循环”，进而维护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同时，美国的霸主地位还通过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的制定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伴随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特朗普政府认为这种格局有损于美国的利益。目前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源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而不公平竞争源于中国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进而最终根源是中国所谓的修正主义模式。在这一逻辑链条中，贸易不平衡只是一个口实，阻碍中国的崛起进程才是真正的目标。因而，倡导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质上是零和博弈思维。

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面对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挑战，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将为经济全

球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将对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改革方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受惠于经济全球化，未来也将必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合作与共赢，基本原则是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目标是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这与反全球化倡导者的零和博弈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有助于弥补当今全球化所面临的“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其次，维护和改革多边合作机制是中国的一贯立场。无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还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中，中国都坚定地站在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上，反对任何撇开多边机制、另起炉灶的做法。最后，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目前，中国积极参与、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如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印太自由贸易区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更为突出的是，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开放性特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同时这一平台又能够与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做到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赋予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特征是中国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将会以自己的方式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为包容性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李向阳